

黄晓华自选集

『立人』的叩问

黄晓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晓华自选集

“立人”的叩问

黄晓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立人”的叩问：黄晓华自选集 / 黄晓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ISBN 978 - 7 - 5161 - 9713 - 4

I. ①立…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051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文学梦（代自序）

年轻的时候，也曾做过很多的梦。

其中，做得最久最沉的梦，就是文学梦。

其实自己并不是出身书香世家。虽然作为小学教师的父亲也曾经拥有一些书籍，但大多是当时政府还是什么机构配备的书，如《十万个为什么》《算得快》之类，文学书籍少之又少。记得父亲为我买的第一本与文学相关的书，大概是一本什么诗词选之类，其中有岳飞的《满江红》。这大概也是自己印象最早的宋词，时间大概在小学高年级。

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在数学方面就已经可以成为只上过高小的父亲的老师了，但语文还是父亲厉害。他的函授教材上，有《诗经·硕鼠》。这时我也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但那些诗词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那只硕大无朋的老鼠，并不能勾起我的文学兴趣。

初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姓魏的语文老师，将我们讲得神魂颠倒，自己的文章也终于有幸被选作优秀之作，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当时颇有些沾沾自喜，因为自己一直在语文上面与自己最好的朋友相去甚远，文章被贴出来，终究也是一种肯定。

但好景不长。初二时，我们那位魏老师被调到了镇中学，这显然是对他的教学能力的一种肯定，但对于我们这些乡村中学的孩子而言，却是一次重大打击。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新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将我对语文的那点兴趣又强行扼杀了。当他在晚自习时因为我看课外书而用“大力鹰爪功”勾着我的锁骨，拖到讲台上跪着的时候，我已经对语文没有任何兴趣，更不用谈什么文学。虽然我上课还是会偷看《玉娇龙》，看《偏向虎山行》，直到有一次被物理老师抓住。他比我们的语文老师要人

道，我去找他要回书的时候，他只是警告我，如果下次再在上课时看小说，要我自己亲手烧掉。

直到我在14岁考上中专，情况才得以改变。

尽管自己的父亲是教师，但我对教师行业没有什么好感，因为觉得太累。父亲在一所山村小学任教，整个学校晚上就他一个人留守。可能因为太孤单，便将我也带在身边。结果，我经常在午夜醒来时，发现只剩下昏暗的煤油灯陪伴我。而父亲则趁我熟睡后去家访，深夜还没回来。虽然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例如有时可以听村子里像唱歌一样的叫骂声，响彻云霄，直到午夜，伴我安眠，但还是觉得做教师这行太累。因此，在填志愿的时候，明确表示，决不报考师范类学校，甚至不愿报考中专。但家里觉得这相当于“跳龙门”，一下子可以农转非，端上铁饭碗，还是替我填了志愿，报了长沙农校，学水产。

1987年秋天，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了长沙。经过了最初的怀乡之后，似乎变得无聊起来。那是一个60分万岁的年代，进了学校，一切都有人负责，以后的工作也由国家负责。我们的任务就是考60分顺利毕业。于是学习完全成为副业。学校的管理与初中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我们还是有固定的教室、固定的座位、固定的老师，每天也有固定的线路。没有人逃课，但也没有人专心上课。

我不知道干什么好。

将父亲回家时为我买的《三国演义》看完之后，一点儿深刻的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是觉得更加无聊。

这时，初中那位语文成绩一直比我好，也一起考上了中专的朋友，忽然给我来信，问我在学校感觉如何。一来二去，他建议我读读书。他说，很多书都非常有意思。

于是按照他开的书目，我一本本读下去。记得最初是《老残游记》。根本没有看出有什么好处。后来是《镜花缘》，这次总算觉得有些意思了，至少比《老残游记》有意思。知道除了《西游记》之外，还有另一些亦幻亦真的故事。

寒假的时候，发现父亲竟然买了一本岳麓书社出版的小字本的《红楼梦》，厚厚的一册。于是看《红楼梦》。以后每个假期，基本都是读《红楼梦》。虽然读了好几遍，但并没有受到它很大的影响。当时最感兴趣的还是中间的诗词，曾经试图将它们都背下来。对后四十回也不太读，

当然，不是因为别人说的那样，写得比前八十回差，而是因为后四十回根本就没有诗词了。那些在前八十回才思泉涌的帅哥美女，到了后四十回似乎一下子都现实起来，根本不写诗了，让人觉得兴趣索然。现在想来，近乎买椟还珠。但重复读一本书，终究让自己变得不是只看故事，能够慢读、细读、精读。

当然，更慢的是背书。长的背不了，短的就是诗词。于是背诗词。曾经与朋友比赛，看谁背得多。当时我们都喜欢李白。买了袖珍本《李白集》，放在口袋里，经常拿出来看看，后来似乎也背得不少。

不过，这种背古诗的劲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朋友的兴趣又转换了。他又向我推荐拜伦、雪莱、莱蒙托夫。于是去看那位很多年后才知道本身也是一位诗人的查良铮翻译的诗歌。最后弄得自己经常很俗气地向人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还没等我习惯查良铮的翻译方式，朋友又开始读托尔斯泰。我还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16岁时将四卷本的《战争与和平》啃完，颇震住了班上的几位同学。其实自己也根本不懂。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总算抓住了它的尾巴。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世界的风起云涌，我的灵魂似乎也变得躁动不安。我与班上的几位同学开始编写班报，对班上的种种弊病大加鞭笞。虽然读者只是班级的几十位同学，但这大概也是自己运用文字的开始，当时相信文字可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但事实上，世界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文字改变半分，充其量只是给自己一点陈旧而老套的回忆。

也是在那个时代，开始读尼采与叔本华。结果，尼采的超人思想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叔本华倒是让我戴上了一副灰色眼镜。当时那本《生存空虚说》被我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遗憾的是被同学借走后就失踪。从图书馆借来了黑格尔的《小逻辑》，读不懂，就抄。抄了一部分，还是不懂，只有放弃。借来黑格尔的《美学》，以为是艺术创作宝典，于是直奔第三卷下册而去，想从中学习写诗，结果发现大谬不然。但从此对所谓艺术理论之类的书籍也兴趣全无。

于是，还是读作品。虽然是农校，但学校图书馆还是收藏了很多文学书籍。除了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供不应求之外，《高老头》《简·爱》《傲慢与偏见》《鲁滨孙漂流记》《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这类书籍

还是能够随时借到。中专四年最美好的记忆应该就是一个人躺在学校的橘园里，闻着野花，晒着太阳，读一本好书。高度近视可能与那段时间在太阳下读书也有关系。所谓的现代派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接触。《百年孤独》的开头同样震惊过我们。《酒吧长谈》很早就买了，但从来没有耐心看完。《追忆似水年华》让大家都兴奋了很久。最引为自得的是《尤利西斯》出来之后，曾夸口说不用看萧乾的注释也没有什么理解障碍。实际上当时最喜欢的还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若有意若无意，似常态似变态。莫泊桑与欧·亨利都太注重故事了，对于没有故事的我，似乎有些隔膜。而海明威则似乎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没有故事的一个模仿对象。再后来才遇到鲁迅。其尖酸刻薄、语带双关、含沙射影甚至影响了我的说话方式，以至于除了真正的朋友，没有人愿意跟我打交道。

在学了四年的水产之后，被分配回老家一个区里的事业单位，负责水产技术推广。在这个年终统计表上有5000余亩水库但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每年的夏季，水库面积会骤降到不足500亩，而且没有任何人会保证你水库中还要留水养鱼，也就是说，我来到了一个根本不能保证有水的地方，水产技术推广自然也只能是纸上画饼。

在这个地方，我过了几年只需要在年终时填几张报表的日子。时间实在太过奢侈。于是和以前谈文学的朋友串门聊天。在月夜骑着单车，走20里山路，到朋友单位聊到天亮，然后又一起骑单车来到我的单位，继续争论所谓的文学问题，在那段日子是常事。没有王子猷“何必见戴”的豁达，但有着同样的月夜出行的随性。以诗会友的范围也经常超出20里，甚至200里。那些学农而又写诗的朋友，散落在周边的几个县。在那个没有手机、电话需预约、写信要半个月才能送达的时代，通信显然无法跟上我们串门的兴致。有时想到了哪位友人，马上就 and 另外的友人结伴去找，结果经常是下了汽车，步行几十里来到朋友工作的山乡，结果却被告知其下乡未归。于是找不到住处的我们，又只好步行几十里回到有小旅馆的小镇。那个时代，我们依旧充满激情。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争着传抄所谓的名家名作。没有正式发表过任何作品，却互相恭维对方是个文学天才，似乎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将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诞生。

我觉得我的长处不在诗歌，因此经常想着怎么和他们别开路向。于是总想着积累素材。这方面的捷径当然是外出打工。我待的那个单位，见不

到几个人，也见不了什么世面，因此也便经常想着出去闯荡。那时我十天半月不在单位出现，也没有任何人关注。于是，我出去“闯荡”甚至都不需要办理什么停薪留职。只是自己的多次“闯荡”，都没有获得站稳脚跟的机会。第一次去广州，走到衡阳，登了一回衡山，看了一回日出，没钱买火车票，只好回来。第二次去广州，在一个苗圃应聘，对方看了我的水产专业毕业证，似乎不太买账；到建筑工地拌了几天水泥，睡了几天的车棚，觉得广州的蚊子实在太厉害，且自己的体力似乎还是大有问题，觉得还是回来领让自己不死不活的工资舒服点。再后来，被一位中专同学忽悠到了云南瑞丽，他说那个地方遍地机遇，只要去了就能发财。而我的确也想发财，便跟着过去了。到了那里，同学要我在一个旅馆等他，他去找他们老乡，再回来接应我。我在小旅馆等了一个星期，中间顺便出了一趟国，花了12元的边境签证费，到缅甸打了个转。遗憾的是，那时缅甸的赌场已经撤了，要不我还可能在赌场上“拣”点钱回来，从而印证同学的那句话。顺便说一句，再次见到那位同学已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他似乎也没有在那里发大财，因此我也便没有任何埋怨的理由。因为就算当时他回到旅馆找我，我也未必能够发财。而且他到底让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经历了很多风险，见识了很多人物，如果要写小说的话，也有不少故事。

只是素材的积累，不仅需要闯荡，而且需要毅力与时间。例如，有人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经历及时记下来。但自己的几次“闯荡”，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人累的时候只想睡觉。曾经在上海也干过几天的推销，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回来，训练者还要大家像打了鸡血一样激昂地交流经验，能躺下来睡觉已经是最大的幸福，记录经验也便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这大概也是现在只看到“打工诗人”，而很少看到“打工小说家”的原因吧，因为写小说的时间对于打工者而言，太奢侈了。

由此，终于认识到，我成不了小说家。

但读了那么多书，成不了小说家，似乎还是可以干点儿别的什么。

于是，真的开始读书，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本科。然后考研。

在我们那些做文学梦的人眼中，自考是堕落的表现。因为，真正的作

家不是从考试中出来的，如沈从文，如高尔基，而是从生活中出来的。我参加自学考试，也就意味着我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文学梦的破碎。

不过，考试倒是极其的简单。那些读过的李白、杜甫、鲁迅、顾城、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让文学史鲜活起来。从来不用复习，也从来没有补考。两年考完专科，两年考完本科。后来才知道，专科与本科不用分开考。如果能够早点儿统筹的话，应该三年能够修完全部本科课程的。

然后考研。倒是考了两次。第一次考的时候，没有抱什么希望，考完便去上海“闯荡”，做最后的发财梦。等知道自己过了国家分数线，但在湖南师范大学排名垫底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已经复试完毕。但这次上线，倒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似乎有“天命所归”“舍我其谁”的意味。在我们那个小镇，考研似乎也很“另类”。如果第二年我没有考上，那可能就更加另类了。

由此在第二次考试前，紧张得有些睡不着。更离谱的是，与我同房的另一位考生比我还紧张。当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他不停地问：“黄晓华，你睡着没有？黄晓华，你睡着没有？”结果我只好陪着他失眠。后来他通过饮酒的方式，终于睡着了，鼾声如雷，而我却再也睡不着。第二天考试时，看那些蟹行文字，很有些蟹行味道。考完下来，自己都不知道能打几分。

运气还好，总算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也是从那时起，文学梦算是彻底醒了。

梦醒了，文学还在。

对曾经的文学梦而言，文学很简单，充沛的情感、深刻的故事、精巧的构思、新奇的修辞、优美的语言就是追求的全部。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人心、改变社会。

但考上研究生之后，却迷惑了。文学研究能做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老师们都没有回答，只是要我们去读书。

第一学期的课，就是扎进故纸堆，读《新青年》。我们几个同学，在文学院的资料室里，将那些发黄发霉的旧杂志搬了出来，每人一本。颜雄老师检查我们读书笔记的方式让人终生难忘。每次他都拿出一个轻巧的弹簧秤，掂量我们所做卡片的重量。在他欣慰的笑声中，我们似乎也明白了

点什么叫作学问。

也是在《新青年》中，大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人”。当时大家颇为激动了一阵，然后老师们叫我们去读相关研究资料。结果发现，早在我开始做文学梦之前，钱理群先生就写了专题论文谈“人的发现”。

于是大家都沮丧了很久，觉得可写的题目早就被别人写过了。

但“人”的发现却从此影响了我的整个研究思路。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

这意味着，文学是写人的。

这句话似乎太普通，但对于我这样愚笨的人而言，却花了很长时间去领悟。

人太复杂、太深刻。不同时代对人似乎有不同的理解。文学选什么样的人来写、如何写，似乎大有学问。

五四文学之所以有“人的发现”，是因为以前不被当成人的妇女、儿童、工人、农民，如此等等，都被当成“人”看待了。他们一直存在着，但很少被当成“人”写入文学，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的“写人”，并不是字面上那样简单，其中隐含着对“人”的理解的差异性。

由此，我将目光投向了文学中的边缘人——狂人。

这是我硕士学位论文《在文明与理性的边缘》的主题，论现代文学的癫狂意象。

答辩的时候，凌宇老师说了一句话，让当时的我倍感振奋，也倍感压力。他说：“希望你以后不要去经商，也不用去从政。”还有一位老师，甚至说要推荐我的论文到《文学评论》去。只是自己当时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并没有就此尝试。等该论文的修改稿真的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时候，已经是九年后的事情了。

实际上，不用凌老师说，我也已经完全没有从政或经商的念头了。因为我就是在那两条路上没走通，才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博士期间，师从易竹贤老师。拿着硕士论文的一节去请教，被圈圈点点回来。如此经历了四五次之后，似乎终于有点儿开窍，明白论文该怎样写了。投稿，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个人认为，这应该算是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的始点。

文学不仅写人，而且“立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一时代之文学，有一时代之对人的理解，有一时代之不同的“立人”理想。

狂人，关系到对“人”的理解的差异性，但身体，则关系到“立人”的差异性。

在博士阶段，于是探讨“立身”与“立人”的关系。博士学位论文《身体的解放与规训》修改后以《现代人建构的身体维度》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胡亚敏老师从事小说修辞研究。对文学“立人”的理解，似乎又深入了一点，那便是认识到，文学中的“立人”，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立什么人”，一个则是“人何以立”。文学“立人”的实现，不可能只是依靠作者对读者的单向度的作用，而必须“使人自立”。也就是文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人立”，也便是让读者自己成长为真正的人。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显然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对于后知后觉的我，却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我由此切入了小说的修辞系统，切入不同时代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有效联系的方式。博士后出站报告《20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流变论》，几番修改后，以《20世纪中国小说修辞史略》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重点，就在阐释现代小说修辞如何沟通“立什么人”与“人何以立”的两个层面，以实现其修辞目的。

于是自己十多年的研究理路，似乎便明晰起来。

本书的编辑体例，基本按照自己的研究理路安排。第一辑“狂人与病人”，由边缘反观常态，从对边缘人的遮蔽与彰显中考察不同时期文学对“人”的理解的边界。第二辑“立身与立人”，由身体反观社会，从对身体的规训与解放中考察不同时期文学“立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第三辑“立人与人立”，由效果反观策略，从对“立什么人”与“人何以立”的互动与勾连中考察不同时期文学“立人”的方法与机制。

说白了，我研究文学，还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梦相似，文学研究也指向了改变世界。不过，与文学梦最终的破碎一致，我的文学研究也没有改变世界。

不过，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它至少改变了我。

因为文学研究，我可以发表论文，可以申报课题，可以评定职称，可以养家糊口。虽然现在写出来的东西，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样，与朋友一起分享讨论，论文的发表之日经常也就是它的死亡之时，但学术研究至少可以让我不再像在以前那个事业单位那样，整天无所事事。

更重要的是，因为文学研究，我可以有机会跟学生谈文学、谈理想、谈人生。

也就是说，文学研究难以实现“立人”，但课堂教学倒有可能促成“人立”。

这让自己忽然觉得文学研究充满了意义。

而人生似乎又充满了梦想。

曾经对学生们说：“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学生毕业二十年后还记得的老师；一是希望写一本出版二十年后还有人看的书。”

现在觉得，后一个梦想似乎有些过于奢侈。

不过，如马云所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当然，我没有他那么乐观。

同时，转念一想，梦想不就是拿来破灭的吗？

所以，为了破灭，梦想也还是要有的。

最后说明，本书中的论文，基本都是“恢复原貌”，与发表时的篇幅有一定差距。像我们这类学界的小字辈，发表文章的艰难，很多人都能理解，删改自然也是常事。能够删改发表，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现在结集，算是可以让它们恢复原貌。

同时，借此机会，对自己十多年来求学与研究之路上诸多曾给予无私帮助的师长亲朋，以及让本书中论文得以面世的诸多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

2016年3月9日

目 录

我的文学梦(代自序)	(1)
------------	-----

第一辑 狂人与病人

传统文化与实用理性的双重解构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癫狂叙事	(3)
断裂与错位	
——论《长明灯》的空间解构意味	(15)
常态与癫狂的价值错位	
——从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看沈从文的深层意识结构	(24)
前期创造社疾病书写与现代人的建构	(33)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	
——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45)
解放区文学中的疾病书写	(57)

第二辑 立身与立人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69)
“看—被看”暴力结构的解构与颠覆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示众母题	(90)
革命与启蒙的互动与背离	
——论解放区文学的婚恋书写	(100)
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	

——论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	(112)
身体与权力的博弈	
——论解放区文学的身体修辞	(124)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	
——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132)
话语的博弈与整合	
——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	(142)
政治·道德·现代性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婚变	(153)
隐喻·换喻·提喻	
——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163)
先锋叙述与身体启蒙	
——论《现实一种》的身体修辞	(177)

第三辑 立人与入立

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	(189)
中国小说修辞的历史视域	(239)
“讹”与“化”:近代翻译小说与中国小说修辞的现代转型	(258)
身体、文化、修辞与“狂人”的生成建构	(275)
《狂人日记》的修辞与现代小说认同机制的建构	(284)
中国现代癫狂叙事的修辞策略与认同困境	(298)

第一辑

狂人与病人

传统文化与实用理性的双重解构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癫狂叙事

作为一种“佚智失理”的异常情态，癫狂自文明伊始，就引起医学家与思想家的关注。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将无法被大众理解与接受的言行视为“癫狂”。中国古代寓言“狂泉”很早就触及癫狂的这种荒谬性。这种属于个体的癫狂与属于社会的常态之间的对立，决定癫狂具有反公共理性——不能为大众理解与反社会文明——不能为大众接受的双重特性。这一双重特性赋予癫狂以一种含混而丰富的意义空间。这种在思想上的开阔性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叙事的多重可能性。癫狂叙事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从而使世界“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①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癫狂叙事传统。从《论语·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到《庄子·人间世》中的楚狂接舆，从《世说新语·任诞》中与猪同饮的阮氏族人到《红楼梦》中“有时似傻如狂”的贾宝玉，从民间传说中的“济颠”（济公和尚）到现实中的“张颠”（张旭）、“米颠”（米芾），癫狂叙事为超稳定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丝异类色彩，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中的“互补辩证法”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②，癫狂

① [法]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69 页。

②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8 页。